

略论 1911 年保定鼠疫

张 鹏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 1911 年发生在保定的鼠疫是由东北大鼠疫蔓延到关内而引发的。东三省鼠疫大流行, 由陆路进入关内的首站就是直隶省, 即直隶省处于关内抗击东北鼠疫传染的最前沿。在当时, 保定作为直隶省的首府, 防疫措施及执行力在整个直隶地区具有代表性。

关键词: 保定; 鼠疫; 宣统; 农村; 防疫

中图分类号: K291/29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3)04-0127-05

鼠疫是一种急性传染病, 不仅传染性强, 而且病死率极高。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鼠疫的研究成果正不断面世^①, 普遍认为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世界性的鼠疫大流行: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 710 年—公元前 542 年, 长达 170 年之久, 死亡人数估计约为 1 亿人; 第二次发生在 14 世纪, 起源于亚洲西南部, 约在 1340 年左右散布到欧洲, 欧洲称之为黑死病, 这场鼠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 7 500 万人死亡, 其中 2 500 万为欧洲人。根据估计, 中世纪欧洲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黑死病, 中国在这次鼠疫流行期间死亡人数“达一千三百万人”^②; 第三次发生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 死亡人数很多, 仅中国在 1900—1949 年就死亡 102 万人。由此可见, 鼠疫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是极大的。保定鼠疫就是发生在第三次世界性的鼠疫大流行期间, 属于东北大鼠疫的辐射影响区域之一。

东北大鼠疫于 1910 年 10 月 25 日始发于满洲里, 随后逐渐蔓延到东北全境, 并通过水路和陆路波及直隶、山东等关内许多地区, 肆虐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给受灾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及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最终于 1911 年 4 月 18 日彻底肃清了此次鼠疫。史学界关于东北地区大鼠疫的研究关注度比较高, 但是关内地区的鼠疫流行至今还没有学者予以关注或关注度还不够, 直隶保定府更是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没有涉及,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关内疫情比较轻, 而且主要集中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 没有造成大面积蔓延。但是这恰恰就是问题的所在, 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关内地区鼠疫没有蔓延, 特别是在地缘上紧挨东北的直隶省似乎相安无事, 很值得思考。本文仅对保定地区 1911 年鼠疫流行状况及应对措施做一番考察, 以求教于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同仁。

一、保定府鼠疫的流行状况

保定府, 为直隶省治, 治清苑, 领州二、县十四: 清苑、满城、博野、安肃、定兴、新城、唐县、望都、容城、完县、蠡

收稿日期: 2013-03-22

作者简介: 张 鹏(1989-), 男, 山西灵石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社会经济史。

^① 此处只列举一些笔者所参考到的研究专著及论文: 专著有伍连德等著《华北鼠疫之研究》, 东省防疫总处 1926 年版;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微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鼠疫流行史》上、下册, 1981 年内部印行; 纪树立主编《鼠疫》, 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洗维逊编著《鼠疫流行史》, 广东省卫生防疫站, 1989 年印等。论文有李祥麟《鼠疫之历史》(《中西医学报》1910 年第 8 期); 李健颐《鼠疫之研究》(《医药卫生月刊》1932 年第 5 期); 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中华医学杂志》第 22 卷第 11 期, 1936 年 11 月); 杨林生、陈如桂、王五一、谭见安《1840 年以来我国鼠疫的时空分布规律》(《地理研究》2000 年第 3 期); 迟云飞《1910 年鼠疫杂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3 年增刊); 李浩《清末庚戌、辛亥年间的东北鼠疫》(《东北史地》2006 年第 2 期); 焦润明《1910—1911 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 年第 4 期); 管书合《1910—1911 年东三省鼠疫之疫源问题》(《历史档案》2009 年第 3 期)等。

^② 关于此死亡数字, 刘建生与王淑纯先生已经做过考证, 详见纪树立主编《鼠疫》, 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0~12 页。

县、祁州、束鹿、安州、高阳^{[1]130}。其中,满城、博野、束鹿、祁州、蠡县等五个地区有鼠疫流行,包括省城在内的其他州县均没有发生鼠疫传染,应该说保定府的鼠疫传播并不严重,但是具体到州县情况却各有不同。为了清晰地了解此次保定府鼠疫的流行状况,下面分述保定府受灾地区的鼠疫流行状况及人口死亡情况,见表 1。

表 1 各州县受灾村庄及伤亡人口情况

州县名	村庄名	伤亡人数	州县名	村庄名	伤亡人数
满城县	汤村	36	束鹿县	马庄	20
	孟村	8		中石干村	1
	郭村	1		大营村	10
博野县	程委村	8		郭西村	9
	刘村	1		卢家庄	16
	西程委村	3		朱家店	24
	解村营	1		木店村	19
	两合成村	23		赵古营	10
	东阳村	7		百尺口	20
祁州	石佛村	3		崔家庄	2
	路井村	3	南李家庄	1	
	南章村	5	磨店村	11	

注:资料来源于《直隶省城办理临时防疫纪实》卷四,《中国荒政书集成》(第十二册),第 8126 页。

满城:满城位于“府西少北四十里”^{[1]130},县境东与保定市郊区相接。在保定府内,满城是最先被发现鼠疫的地区。“今闻关东吉林闹这个病(指鼠疫,笔者注),一天死一百多人。漫漫的传到山海关,又到了天津、北京。满城汤村有一个人从吉林来,患这个病死了”^{[2]8071},从官方的往来电文中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十二月二十五日电文称“满城疫患,即飭设法消弭”,同日的另一则电文也称“满城有一二人自奉染病身死”^{[2]8019-8020},一时之间,朝野上下均将目光投向了满城。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满城县的鼠疫流行主要集中在农村,受灾 3 个村,因灾共死亡 45 人,其中汤村的疫情最严重。有关汤村的具体染疫情况,据当时的人称:汤村有一个叫张洛登的人由哈尔滨回来,不到两天就疫发身亡了,几天后他的家人也相继疫死,家中只剩下妾一人幸免,忙着给人殓,邻里看着怪可怜,一时就有十二家一同帮着入殓,不幸的是这十二家均被传染,也相继死了。之后由于防治及时并无再传染。孟村的情况笔者推测是和汤村一样的,因为“年前腊月间,汤村、孟村……始发现此症”,这两村不相邻,且汤村已经被及时地与外界隔离,因此孟村也是由本村人从鼠疫传染地染疫回来,在家人和邻里之间传染的。

由于医官和委员及时地对受灾各户进行了消毒与处理,“自年前至今,更无类似瘟疫之病……汤孟两村均甚平安”^{[2]8095}。之后满城县李令骏稟报,“汤孟等村现在疫气消除净尽,他村亦无患病之人”^{[2]8112},三月初四,满城县疫患一律肃清。

综上,满城县鼠疫流行的特点是仅在个别村庄进行,并没有扩散他处,由于处置及时,故持续时间很短,主要是年前腊月间严重,因此满城县的疫情是比较轻的。

博野:博野县位于保定市南部,北距保定 50 公里,与蠡县、祁州交界,此次蠡县与祁州也是鼠疫蔓延地区(后文将论述两地情况,此处不再赘述),因此博野不仅面临着自身鼠疫的困扰,而且防疫任务也是相当艰巨的。

分析表 1 博野的受灾情况可以看出,灾情蔓延 6 个村庄,因灾死亡 43 人,其中两合成村是疫情最严重的村庄。博野县最先流行鼠疫的是东阳村,“东阳村王小磨由哈尔滨回村死,以致传染两合程”(“两合程”指两合成村和程委村,笔者注),之后鼠疫又从这两村开始向其他周边村庄扩散,“刘村已死一十四岁女孩”。程委村陈姓腊月赴解村营服侍病人,“其所服侍者已死去 8 人”^{[2]8099},陈姓“乃于初一日回家,初三日即死”,虽没有说明陈姓染疫,但是根据表 1 及鼠疫已经传到程委村的事实来看,陈姓应该是在染疫后(自己并不知道染疫)才去的解村营,先后传染所服侍的 8 个病人,以致其先后死亡,最后自己回村后也突发鼠疫而死。按照这个情况来看,表 1 中关于程委村和解村营的伤亡人数应该是报反了。正月三十,“博野之程委等五村经西医在彼消弭见效”,“一律平静”。

束鹿县:束鹿县,即现在的辛集市,清代属保定府管辖,位于府南少西 240 里,是当时距离省城最远的县城。

从表1所列村庄的数量及伤亡人数来看,束鹿县的此次的鼠疫流行是很严重的,不仅波及的村庄范围广,而且伤亡人数也是很大的,其中马庄、朱家店、百尺口的死亡人数均在20人以上。

关于束鹿县此次疫发的原因,“查深、束、冀各属,皆发源于束鹿卢家庄宗至正,自去年由东回里患疫,波及全村,风扬各处”,另据该县调查委员徐令桐阳第一次报告称:束鹿城内以及北露河营和禾井路郭村等村,现均尚未染疫。惟束鹿县城南卢家庄,客腊有自哈回家疫死者,传染朱家庄、马庄、木店、赵古营等村,蔓延甚烈。各村人心惶恐,染疫死者甚众。赵古营一家十一口,竟死九口。“现在灾尚未已”^{[2]8104};正月三十,委员又查得马庄“今晨刘洛聚之女又死”^{[2]8106},二月初二三日,“又县城南三十里之百尺口郭姓家疫死三人,又疫死董姓一人”,初三日“束鹿马庄郭拉拉疫死”,初四日“郭西村李氏子死”,大营村张立勤之媳、之妻相继死了,五日,张立勤的孙女又死了,张顺发也于这天疫死了,“张魁顺家续死三口”,初八日,“又百尺口之郭高升与其母及郭二仓均疫死了”,“又郭高魁与其母及其弟妇”,初十日,(大营村)“张立勤家续死二口,郭西村岳长玉家续死一口”^{[2]8111-8112},十九日,“马庄又报毙赵大庆一人”^{[2]8119},二十三日,南李家庄刘大嘴因抬埋疫尸传染死了。可见灾情之严重,几乎“连日均有病死者”^{[2]8104}。

综上,不难发现束鹿县的疫情传染过程与博野县有着极其相似之处,那么博野县在短短的几天就把疫情控制住了,而束鹿县却出现了一发再发的传染态势,为什么会这样呢?仔细梳理束鹿县的疫情传播状况及应对情况发现,年前腊月间就出现了鼠疫传播,年后正月二十七省临时防疫局才接到调查委员的报告,之后才派人开始控制疫情,之前均没发现有专人去对有疫地方进行处理及消毒,“该县染疫村庄不止一处,死亡至六七十名之多。设非派医到深州查勘明确,几为该令暨委员张光燾会稟所误。本署深愧委用非人,良用惭愧”^{[2]8062}。原来委员没有尽到职责,玩忽职守,以致惨剧一发再发。后“经崔、张、陈三医先后协同消灭”^{[2]8034},“旬余以来,并无再有传染,实系一律肃境”^{[2]8036}。

从表中可以看出,祁州此次的灾情比较轻,3个村共11人因疫死亡,其中路井村疫死的人为郑凤春及其叔郑小同、其母郑张氏,均于年前腊月间病故,已经“将其房墓如法熏掩”,疫情没有再扩散。南章村的情况是李洛起在二月初三染疫,二月初七疫毙,同日“复有王连春与其母均被伊兄王大春传染身死”^{[2]8111}。至于石佛村,由于没有相关具体记载,笔者推断大概和路井村的情况一样,疫情只是在同一家传染,由于及时消毒与处理,故无扩散。

蠡县:蠡县位于府南少东90里,距博野县界仅10里,只有大百尺村一个村发现鼠疫,也是此次保定鼠疫中唯一一个被鼠疫灭绝的村庄。在格雷医生《鼠疫在华北的流行》报告中记录了蠡县大百尺村鼠疫袭击的整个过程:“在蠡县,刘易斯医生发现一个男人,他告诉刘易斯,全家已经死去30多口,自己是唯一幸存的成年人。第二天上午,当刘易斯医生返回这个村庄的时候,他看到这个男人正在咳血痰。从村中第一个人死去到此时为止,只有5天时间,但这个男人已经照顾最后一名患者了。在他死去之前,刘易斯医生在其痰液中发现了鼠疫菌。三天之后,他的4个孩子都已死去,整个小村庄灭绝了。”^{[3]39}事后“已用石灰将棺口封固,并烧毁死者衣服”^{[2]8119},“现无传染之人”^{[2]8121},境内“疫气消灭,地方安静,民情熨贴”^{[2]8035}。

综上所述,保定鼠疫从宣统二年(1910年)腊月间流行,到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初境内鼠疫消尽,历时70余天,传染过程表现为发生鼠疫的各个县均有一个传染源,均为本村人从东北染疫回乡后疫发身亡,然后从家人开始逐渐蔓延到周边邻里。传染地区全部发生在农村,且南边比北边的疫情更严重些,波及了满城、博野、束鹿、祁州、蠡县的大小村庄24个,因灾死亡人数247人,给受灾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由于措施得当,最终在较短的时间内战胜了这场鼠疫。

二、保定府对境内鼠疫流行的应对措施

通过以上对保定各疫区情况的论述,从发生鼠疫病例到疫情结束,这期间时间都是较短的,那么是怎样的应对措施使得保定鼠疫能够如此迅速的肃清呢?保定府在接到北京民政部“据日使函称,风闻保府鼠疫流行”^{[2]8019}的电文后,全府上下迅速布置,一场轰轰烈烈的抗击鼠疫的战役至此拉开了帷幕。保定当局在应对此次鼠疫流行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以下三方面的措施:

第一,组建了各级防疫组织。首先,成立了省城临时防疫会,于1911年2月26日早晨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粗拟大纲”,并布置满城汤村的防疫任务,后将省城临时防疫会更名为直隶省城临时防疫事务局,“归布政司监督,掌理省城及保定府属外州县防疫事务”。其次,设立了直隶临时防疫局病院,“以备检有染疫或疑似染疫之人,分别送入”^{[2]8075-8076}。再次,设立了直隶省城临时防疫所,地点在保定西关火车站,专为检查外地来保人员是否染疫,以免疫

情经铁路传入到保定境内。最后,在各州县及疫情较重的地区设立了临时防疫分局或防疫会社,派驻委员到各州县进行宣讲防疫知识及随时报告所在地的疫情,并不定时地派调查员深入疫点调查疫情,监督各地防疫事务。

第二,颁布了各种防疫章程。保定鼠疫发生后,保定地方当局对制定各种规范防疫行为的规则特别重视。1911年初天津卫生局拟定了《查验火车章程十五条》,保定根据防疫之需要,又具体制定了《直隶省城临时防疫所章程》,主要检查通过火车来保人员。保定府还公布了《直隶省城临时防疫局普通防疫规则》、《直隶省城临时防疫局分区调查客店章程》等等,为了保证这些章程能够执行到位,有些章程里明确列出了一些强制措施,如《直隶省城临时防疫所章程》中:“如过有不受检察之人及染疫不肯入病院者,出巡警迫令前往”,《直隶省城临时防疫局分区调查客店章程》中:“各店户如有不遵调查员劝诫者,可由各该员请警察强迫之”等等。总之,为了应对鼠疫灾情,保定当局颁布了一系列防疫规则,这些规则涉及到防疫的整个过程,为防疫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第三,采取具体的防疫措施。保定在防疫过程中采取的具体防疫措施有:(1)隔离交通,就当时清政府而言,及时阻断了关内外铁路交通,以免鼠疫通过铁路继续向关内蔓延,1911年1月13日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卡严防。“天津卫生局为应对鼠疫,专门制定了查验火车章程15条”^[4]。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1月16日在山海关沟帮子查有病人就地截留。1月20日邮传部电令停止由奉天至山海关的头等车。1月21日下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5]《宣统政纪》卷47。就直隶省城而言,当某个村庄或城镇爆发鼠疫的时候,要尽最大的可能,切断所有与疫区相连的交通,就这点而言,从结果上看保定府做的是有成效的,疫情没有扩散出疫区;(2)建立隔离营及临时避疫所,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并把疫区健康民众安排到临时避疫所进行避疫;(3)处理鼠疫死亡者尸体,一种方式是掩埋尸体并用石灰将棺封固,另一种方式就是直接火化;(4)对疫区进行严格消毒,采取的主要方法是焚烧房屋、碳酸喷洒、升汞擦洗和硫磺熏蒸;(5)普及卫生知识,通过公开讲演、发行小册子、张贴海报和大众公告等办法向人民普及卫生知识,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释鼠疫的性质,宣传预防及其蔓延的措施,动员所有人由通报信息来帮助当局等等。

除此之外,保定还效仿吉林省的防疫办法,建立了逐日报告制度,要求各防疫机构及委员等必须逐日向省城临时防疫事务局详细呈报各地发现的疾病及检查治疗结果。

保定在这次预防与消灭鼠疫的过程中特别令人称道的是没有让鼠疫通过铁路传染进保定,有鼠疫的几个地区也不是在铁路沿线,这与东北鼠疫的传播模式截然不同。东北鼠疫流行方向和路线大多是沿着铁路交通线呈爆发状流行。从满洲里而哈尔滨而长春而吉林省城吉林。“凡延近铁路区域,逐渐波及”。双城知府报告说“距车站铁轨近,疫盛时疫毙最多”。鼠疫沿铁路沿线迅速向内地蔓延,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极惨然”^[6]。而保定就是在疫情传播最严重的束鹿县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出现疫情能够得到及时的掩埋与消毒,并迅速把交通给阻断,所以并未出现沿交通线呈爆发状流行的现象。

综上所述,保定鼠疫的整个防疫工作主要以政府为主的,因为疫区全部在农村,农民没有力量去组建防疫组织,也没有能力科学地认识鼠疫,因此纵观整个防疫过程,哪里有鼠疫,哪里就有委员、医官等组织村民进行科学处理及预防,应该说政府在消灭鼠疫的过程中始终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但是抗击鼠疫斗争的胜利也离不开普通百姓的配合,“尤其在中国,由于在普通民众和政府官员中普遍缺乏现代卫生知识”,难免会对现代卫生预防措施进行强烈抵制,“在经历一段对威胁切身利益预防措施的激烈抵制之后,他们(指普通民众,笔者注)转而一心一意地支持卫生当局”。因此,抗击鼠疫斗争的胜利,“不仅要归功于政府官员的尽职,而且更多要归功于普通民众的智慧”^{[3]559}。

三、结语

通过以上对保定鼠疫传播情况以及应对措施的论述,不难总结出此次保定鼠疫的传染模式与应对策略,概括起来就是“点点传染,面面应对”,即传染模式表现为点到点的传染,各点之间相互独立,但是应对策略却做到了面面防疫,这从《省城临时防疫局逐日报告》中可以得到体现。不仅保定是这样,整个直隶省城均是如此——传染模式和应对策略均与保定相同或相近。整个直隶省城的鼠疫主要分布在保定府的南部及东南部,也是呈点状分布。面对从东北传播过来的鼠疫,保定府北边及东北方向的容城、安肃等地区并没有出现疫情,而疫点却集中在了保定府南部地区。

当时的外国专家已经对此进行了相关的调查及研究。直隶、山东两省在满洲的劳动力在鼠疫发生之前逐年增长,“由于冬季严寒,户外的的工作停止,他们要按原路返回家乡”^{[3]516},陆路上通过铁路,还有就是海路。山东苦力或

从大连经海路回家,这条路最近,选择的人会多,或乘火车到天津通过陆路回家,而直隶苦力则乘火车到天津然后沿公路回家,皮特里在他的总结报告《1900—1911年华北各省肺鼠疫流行病学方面的回顾》中在谈到没有受到鼠疫波及和传染轻微的城镇中称一方面是因为“流动的苦力没有在此停留,而且为了尽早回到遥远的南方家乡,通过的速度很快”,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地区均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那么我们再结合保定鼠疫流行的情况很容易推断出发生鼠疫的地点之所以呈点状分布的主要原因就是携带鼠疫病毒者在这些地区停留或家乡就在此处,当他们身上的鼠疫病毒爆发的时候一种途径是直接传染给他亲密接触的亲人,即通过人到人的直接传染,另一种途径就是间接传染,即通过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物品的间接传染。

此次鼠疫从东三省迅速向华北蔓延,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亡人数就超过了16 000人。我国传统上对天灾比较重视,而对瘟疫一直以应急性、临时性的态度来对待,并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卫生防疫体系。我国虽在西周初期就建立了医事组织,但在数千年的古代社会中,主要是为皇室和官僚服务的,广大民众的医学知识以及卫生服务和保障水平相对较低。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学”的进一步引进与传播以及租界“卫生规范与制度化管理,给华界政府以良好的正向示范,激发了华界政府的民族意识与竞争意识”,租界公共卫生管理的殖民性又“给华界官方和民众以反向刺激……激发了华界民众的民族意识和自强意识”^{[7]291-292},于是在变法舆论压力和疫病流行的情况下,清廷开始着手施行卫生新政,1905年清政府设立巡警部卫生科。并于1906年改巡警部为民政部,卫生科改为卫生司,同年设立了内城官医院,1908年设立了外城官医院。至此,中国才初步逐渐建立起了一套近代化的卫生医疗体系。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保定地方政府才能够在这次鼠疫袭来时迅速组织起力量,在西医的帮助下有效地控制了疫情。

鼠疫是有史以来给人类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的传染病之一。此次保定鼠疫主要发生在农村,应该说保定在防治鼠疫传播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通过考察保定鼠疫在农村的流行情况及应对措施,使我们清晰地了解了鼠疫怎么传播、有哪些因素可以导致它扩散以及农村地区在应对鼠疫所表现出来的不足,均对我们今后防疫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光 绪.畿辅通志:第七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 [2]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荒政书集成:第十二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 [3]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 [4]京津防阻鼠疫南下续纪.申报[N].1912-12-25(5).
- [5]清实录:第60册(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6]焦润明.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J].近代史研究,2006(3):106-124.
- [7]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Study on the Pestis of Baoding in 1911

Zhang Peng

(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ng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The pestis of Baoding in 1911 was caused by the great plague of rats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The pestis was popular in the Northeast province, and the first station inside Shanhaiguan Pass by road was Zhili province, in other words, Zhili province was on the forefront for fighting the plague. In that time, Baoding was the capital of Zhili province, its anti-epidemic measures and executions were very representative.

Key words: Baoding; pestis; Xuantong; village; epidemic prevention

(责任编辑 张春生)